



典型研究

Dian Xing Yan Jiu

白领新移民身份疏离与

社会信心差异化

——以上海市为例

□ 丛玉飞

摘要 :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系统考察白领新移民身份建构状况及其对社会信心的影响后发现:白领新移民内部分化为根植型、边缘型和漂泊型三种不同的群体类型;身份疏离致使白领新移民社会信心呈现差异化,每一类白领新移民内部的差异较小,而各类白领新移民间的差异较大;进一步分析表明,白领新移民身份建构过程中面临的制度性“失根”和身份认同失调是提升该群体社会信心必须重视的因素。

关键词 :白领新移民;身份;社会信心

一、问题的提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地推进,多样化的移民潮相继出现,这在“北上广”一线大都市尤为明显。据初步估算,1992年后进入城市的白领新移民大约有1.8-2亿人,2004年以后每年约有200万涌入城市^[1]。作为移民群体的重要组成,白领新移民是推动城市实施人才开发战略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若能准确把握该群体社会信心变化的趋向,对于维护社会和谐

与稳定,避免社会矛盾和冲突都将有利无害。依据现代建构主义的动态身份理论,白领新移民所获得的身份是由社会建构的,受到主观自我认同和客观社会因素共同影响,换句话说,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白领新移民完成身份建构,这一理论预设成为本文深入论证的逻辑起点。但在行动个体的差异性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双重影响之下,白领新移民群体身份认同趋于何种态势?身份表征对白领新移民社会信心又有何影响?本研究试图通过2011年“上海市新白领调查”数据,对以上问题加以探讨。

二、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

问卷数据来自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2011 年 7 月进行的上海市白领生活压力与社会信心调查。根据课题的研究需要及上海的实际情况，在调查实施过程中，样本选择的指标操作化为：(1) 大专及以上学历，(2) 从事非体力劳动的职业，(3) 在上海工作或生活一年以上，(4) 年龄小于 45 岁，(5) 出生地非上海，户籍不限。鉴于上海现行户籍政策的限制以及调查白领新移民的难度比较高，我们采用了“受访者推动抽样 (Respondent Driven Sampling)”方法来获取白领新移民的样本^[2]。本次调查成功访问了 1046 名白领。为了研究的对比分析，在抽样推动的过程中对一些指标进行了配额：在体制内工作的，不少于 100 个；在新兴行业工作的，不少于 100 个；非上海人转为上海户籍的，不少于 100 个；来上海十年及以上的，不多于 100 个。此外，为了避免访问对象出现较高的同质性，对受访者推荐的符合条件的同一企业/单位里的访问对象数量也进行了控制：一千人以下的企业，不超过 5 人；一千人以上的企业不超过 10 人。调查数据显示，样本和总体在性别、年龄、户口状况、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工作单位性质等指标的分布比较接近，具有代

表性。

2. 变量操作

根据本次数据社会信心的测量指标，本文运用主成份因子分析法，9 个变量成功析出 3 个因子：即期生活满意度因子、预期社会信心度因子、社会行为意向因子。为便于在回归模型中清晰的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对因子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其转换为 1—100 之间的分值。同时，将社会信心 3 个因子分别乘以各自的方差贡献率建立社会信心总量，得分越高则说明社会信心越强。

同时，本文对白领新移民身份建构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进行操作化，将客观建构操作为一个虚拟变量，仅当被访者具有本市户口或者在沪已购商品房，赋值为 1，命名为身体植根，表示完成客观身份建构；余者赋值为 0，命名为身体漂泊，表示未完成客观身份建构。主观建构的具体测量指标为主观归属感认同，“你认为自己属于……？”仅当被访者选择上海人、新上海人或者既是上海人也是外地人，赋值为 1，命名为精神植根，表示完成主观身份建构；选择既非上海人也非外地人、外地人和说不清楚的被访者，此指标赋值为 0，命名精神漂泊，表示未完成主观身份建构。白领新移民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如表 1 所示，其在移民过程中身份建构结果存在差异，这是否会对该群体社会信心产生影响？

表 1：分析变量描述性统计 (N=984)

变量	均值	标准误	变量	比例 (%)
年龄	28.25	4.889625	性别 (男)	48.42
受教育年限	16.31	1.100477	客观身份建构(身体植根)	44
收入	8.08	7.251595	主观身份建构(精神植根)	51.93
即期生活满意度	56.84304	13.73171		
预期社会信心度	55.73533	16.93063		
社会行为意向	55.52701	17.50134		
社会信心总量	59.38032	13.47603		

为说明这一问题，具体而言，我们需要考察身份建构中客观身份建构和主观身份建构两个变量对白领新移民社会信心是否有显著影响。对于社会信心的测量，使用前文由因子分析产生的“即期生活满意度”、

“预期社会信心度”和“社会行为意向”三个变量，而且还要引入社会信心总量进行考察。模型还包括 4 个控制变量，分别为性别、年龄、教育年限和收入对数，其中对个人年收入进行对数处理 (见表 2)。

表 2 :身份建构对社会信心的影响作用（OLS）

	即期生活满意度	预期社会信心度	社会行为意向	社会信心总量
性别				
(男性 =1) a	- 1.750	- 3.595**	- 1.341	- 3.125***
	(0.906)	(1.109)	(1.087)	(0.876)
年龄	- 0.0860	- 0.488***	0.672***	0.0579
	(0.105)	(0.129)	(0.126)	(0.102)
教育年限	- 0.468	- 0.899	- 0.430	- 0.843
	(0.446)	(0.545)	(0.534)	(0.431)
收入对数	3.227***	1.512	0.902	2.870***
	(0.766)	(0.937)	(0.918)	(0.740)
客观身份建构 (身体植根 =1) b	0.863	- 5.965***	5.941***	0.726
	(1.095)	(1.341)	(1.314)	(1.059)
主观身份建构 (精神植根 =1) c	2.700**	3.473**	6.461***	5.988***
	(0.948)	(1.161)	(1.137)	(0.917)
常数项	59.92***	84.01***	36.61***	64.26***
	(7.379)	(9.033)	(8.850)	(7.136)
R ²	0.038	0.075	0.167	0.092

括号内为标准误，*p < 0.05，**p < 0.01，*** p < 0.001。
 参照组 :a 女性 ;b 身体漂泊 ;c 心理漂泊。
 各模型的样本量均为 947。

从表 2 白领新移民身份建构与社会信心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来看，控制变量中男性在预期社会信心度和信心总量上都要显著低于女性；年龄越大，预期社会信心度显著降低，但在社会行为意向方面又有所提高；教育年限未见显著影响；收入的提高，对即期生活满意度和信心总量提升有显著帮助。

控制自变量后，考察身份建构对社会信心的影响。客观身份建构对社会信心总量和即期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未呈显著性，但身体植根者的社会行为意向得分明显高于身体漂泊者，其留在上海的意向较显著；而对于预期社会信心维度，身体植根者的信心度反而弱于身体漂泊者。主观身体建构对社会信心的影响非常显著，观察主观完成身份建构的精神植根者，其“即期生活满意度”、“预期社会信心度”、“社会行为意向”和“社会信心总量”的得分显著高于精神漂泊者，说明精神上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对自己和整个社会的信心也越高。

三、白领新移民身份建构

及对社会信心的影响

1. 白领新移民内部身份分化

从上表回归统计结果我们看到，无论对白领新移

民的主观身份建构还是客观身份建构，都或多或少对社会信心产生显著影响，也就是说，任何单一的分层划分方法势必会掩盖一些信息，这要求我们将身份建构作为一个综合性指标来操作。当我们将主客观身份建构叠加起来看，白领新移民全部完成身份建构的占总体的 30.39%，主客观身份建构完成一项的占总体的 31.3%，均未完成身份建构的占总体的 38.31%。我们依据主客观身份建构完成程度对白领新移民进行分类划分，白领新移民内部依次分化为三种类型：根植型白领新移民、边缘型白领新移民和漂泊型白领新移民。

2. 白领新移民社会信心差异化表征

我们以白领新移民内部分化出的三类群体作为自变量与他们的社会信心得分进行一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见表 3），白领新移民内部存在明显的差异。从各部分均值来看，各类白领新移民的信心指数基本偏低，尤其漂泊型白领新移民的社会行为意向得分均值低于 50，呈现逃离上海的趋势。从方差模型的显著性来看，组间方差远远大于组内方差，说明每一类新的白领新移民内部的差异较小，而各类白领新移民之间的差异却较大，可见白领新移民身份建构对社会信心影响有非常显著的作用。

表 3 :白领新移民内部群体的社会信心平均分及方差分析

		即期生活满意	预期社会信心	社会行为意向	社会信心总量
均值 (标准误)	根植型白领移民 (n=302)	59.53 (13.35954)	52.91 (15.13194)	63.50 (17.13269)	63.40 (12.74353)
	边缘型白领新移民 (n=317)	56.59 (12.94462)	56.35 (18.11204)	56.28 (16.34323)	59.85 (12.78226)
	漂泊型白领新移民 (n=382)	54.92 (14.32565)	57.47 (17.04149)	48.59 (15.83525)	55.81 (13.66909)
方差分析	组间方差 (df=2)	1780.99	1816.68	18667.16	4854.36
	组内方差 (df=981)	185.31	283.53	268.86	172.08
	F 值	9.61***	6.41**	69.43***	28.21***

表中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05, **p < 0.01, ***p < 0.001

3. 白领新移民社会信心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四个回归模型深入考察白领新移民的社会信心取向, 进一步比较白领新移民中身份建构程度不同群体的社会信心差异。每个模型针对一个社会信心测量维度, 因变量为三个社会信心测量维度和社会

信心总量。自变量为白领新移民的三个类别分类——根植型白领新移民、边缘型白领新移民和漂泊型白领新移民, 其中漂泊型白领新移民为参照组。同上文回归分析, 模型纳入四个控制变量, 分别为性别、年龄、教育年限和收入, 相关统计描述见表 4。

表 4 :线性回归模型系数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模型 1 即期生活满意度	模型 2 预期社会信心度	模型 3 社会行为意向	模型 4 社会信心总量
男性 a	-1.711 (0.905)	-3.333** (1.121)	-1.327 (1.085)	-2.986*** (0.880)
年龄	-0.115 (0.104)	-0.598*** (0.129)	0.666*** (0.124)	-0.00791 (0.101)
教育年限	-0.604 (0.445)	-1.264* (0.551)	-0.453 (0.533)	-1.084* (0.433)
收入对数	3.253*** (0.768)	1.259 (0.951)	0.891 (0.921)	2.772*** (0.747)
边缘型白领新移民	1.003 (1.081)	-0.383 (1.338)	6.209*** (1.296)	3.289** (1.051)
扎根型白领新移民	3.899** (1.228)	-1.479 (1.520)	12.46*** (1.472)	7.360*** (1.194)
常数项	63.08*** (7.314)	93.03*** (9.056)	37.17*** (8.771)	70.11*** (7.113)
R ²	0.038	0.053	0.167	0.081

表中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0.05, **p < 0.01, ***p < 0.001。

类别参照组为漂泊型白领新移民。

各模型的样本量均为 947。



(1) 即期生活满意度

即期生活满意度指数的平均得分和回归分析显示出相同的结果,即在即期生活满意度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类别差异。表3所列各指数的平均得分表明,一个类别的身份建构完成度越高,其成员的生活满意度越高。根植型白领新移民的即期生活满意度指数得分最高(59.53);其次是边缘型白领新移民(56.59);漂泊型白领新移民的生活满意度最低(54.92)。表4中即期生活满意度指数回归模型的边缘型白领新移民回归系数不显著,但根植型白领新移民的回归系数显著,且都为正数,表明在相同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收入的情况下,根植型白领新移民的即期生活满意度明显高于漂泊型白领新移民。回归模型中性别、年龄和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说明男性和女性之间,不同年龄和教育年限的个人在即期生活满意度方面不存在差异。而收入对数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收入影响个人的生活满意度,收入的提高对即期生活满意度提升有显著帮助。

(2) 预期社会信心度

表6数据呈现一种身份建构完成度越高,预期社会信心度越低的趋势。其中漂泊型白领新移民的预期社会信心度最高(57.47);其次为边缘型白领新移民(56.35);得分最低的是根植型白领新移民(52.91)。表4中模型2的所有类别回归系数都不显著,说明各类别的预期社会信心度基本相似,平均数所呈现的趋势未获验证,但值得深入考察。另外,性别、年龄和教育年限的影响显著,且为负数。说明男性的预期信心弱于女性;年龄越大,预期社会信心度指数显著降低;受教育年限较高的被访者反而预期社会信心度较低。收入对数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统计检验。

(3) 社会行为意向

社会行为意向指数得分和回归系数分析也同样显示了类别差异,身份建构完成度越高其社会行为意向得分越高。表3所列各类别的社会行为意向指数得分中,根植型白领新移民的得分最高(63.50);其次为边缘型白领新移民(56.28);漂泊型白领新移民(48.59)低于50分,呈现逃离上海的趋势。表4模型3中各类别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也验证了这一结果。说明在控制性别、年龄、收入和教育年限后,根植型白领新移民和边缘型白领新移民的社会行为意向指标都显著高于漂泊型白领新移民。控制变量中,性别、教育年限和收入对数的回归系数未见显著性,对社会行为意

向的影响不存在差异。但年龄回归系数显著,即表明年长的人对留在上海的意向较强。

四、结论与讨论

1. 白领新移民社会信心的基本态势

本文通过考察主客观身份建构对白领新移民社会信心的影响发现,单一的身份建构形式不能全面诠释社会信心的内在影响机制,因此需将身份建构视为一个综合性指标,采用主客观身份建构叠加策略,进而依据主客观身份建构对白领新移民进行类别划分。结果显示,白领新移民群体内部出现身份分化,具体分为根植型白领新移民、边缘型白领新移民和漂泊型白领新移民三种类型。不同的白领新移民的身份类别对社会信心各维度:即期生活满意度、预期社会信心度和社会行为意向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白领新移民内部分化对社会信心所产生的影响结果存在明显的差异,每一类别的白领新移民内部的差异较小,而各类白领新移民之间的差异却较大,可见白领新移民身份建构对社会信心的影响确实存在显著作用。

具体说来,随着身份建构完成度越高,不仅即期生活满意度越高,而且社会行为意向(主要指居留上海的意愿)得分也越高,三个类别的白领新移民得分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是:根植型白领新移民、边缘型白领新移民、漂泊型白领新移民,这种结果与我们通常意义上地理解相符合。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身份建构完成度越高,却呈现预期社会信心度越低的趋势,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是:漂泊型白领新移民、边缘型白领新移民、根植型白领新移民。原因可能有这样几点:一是通常而言,根植型白领新移民相对于其他两种类型的白领新移民来说,其拥有的资源和相关利益无疑是较多的(比如不用过于担忧本地户口或住房的问题),但在当前上海大都市激烈的社会竞争之下,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底层群体“仇富”心理导致极端行为等社会现象频发,社会风险的不可预知性使白领新移民群体社会安全感、信任感大大降低,再加上政府针对白领新移民的相关政策和法律还不健全、不系统,这就致使白领新移民群体中的既得利益群体不可避免地担心已有的资源和利益被剥夺,进而间接影响了他们对未来信心地提升。二是漂泊型白领新移民在本文中指的是户口或住房缺失的群体,他们多数是一些青年白领新移民,来上海的时间相对较短,一般都拼劲十足,而且他们的心态也较为放松,往往抱着“干

得好就留,干不好就走”的“试试看”、“无所谓”的心态,因此他们可能更关心当前的物质和利益,对未来的担忧反而较弱。

2. 制度性“失根”与植根

在本文白领新移民身份建构对社会信心的影响因素中,户口和住房起到非常显著的相关作用,而这两个因素与目前我国存在的诸多针对城市移民的社会屏蔽制度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虽然各城市正逐次推行户籍制度改革,但城市移民的工作、福利、社会保障等切实利益仍与是否拥有本地户口紧紧连在一起。“城市政府凭借既有的户籍制度,城市行政管理系统和劳动部门、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等各个系统将迁移人员排除在城市居民之外,使迁移人员成为事实上的城市里的非城市人,制度规定的非市民”^[3]。可见,即使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户口的作用正逐渐淡化,但户口仍被视为居民身份的主要标志,拥有本地户口就意味着获得了融合共生的制度性保障,对于身处于上海大都市的白领新移民来说同样如此。本地户口缺失使上海市的白领新移民不同程度经受来自制度、社会和文化上的排斥与歧视,在相关政策安排上难以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待遇,成为制度上的“二等公民”,由此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使他们无法真正融入都市的生活圈。

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白领新移民最初都是满怀梦想来到城市,作为城市的居民,在“安居方能乐业”的传统的“家”观念影响之下,解决住房问题,是彻底融入城市,成为都市人的重要印证,但城市房价不断飙升的现实使他们举步维艰。上海的住房状况则更为严峻,有调查显示,住房问题是上海城市青年移民迫切要求解决的首要问题,但住房问题对该群体工作和生活等造成了很大压力,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存与发展^[4]。本调查数据也发现,多数的白领新移民在上海买不起房,将近半数的被访者认为住房费用是日常开支最重的负担之一,住房就好比一座大山使上海白领新移民不堪重负而沦为“房奴”,有恒产者有恒心,住房问题极大影响了白领新移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提升,以及都市居留意愿的选择。

简而言之,白领新移民自身因户口或住房的缺失,所对应的社会歧视性政策使其不能得到社会合法性的制度认同和城市主流文化的接纳,该群体极可能成为“虽身居城市,却无法作为一个永久性居民被接收,或可成为在脱离原有社会体系之后,又并未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之中,从而成为了‘双重边缘人’”^[5]。从调查可看到,相当一部分白领新移民在心理上并没

有对上海形成明确而坚定地认同,身体的“失根”与心理的失落极可能导致白领新移民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漂泊。从根本上讲,白领新移民陷入“落地未生根”的尴尬状态的主因是隐藏在户口与住房背后的制度性排斥所引致的制度性“失根”现象,难以跨越的社会制度性因素使与该群体相关的诸多利益受到削减甚至剥夺。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控制社会屏蔽制度对白领新移民所造成的社会排斥和社群隔离,加快消除区域户口差异,加大住房制度改革力度,从制度上控制对白领新移民的排斥和歧视,这才是提升白领新移民社会信心的根本举措。

3. 身份认同失调与重塑

数据结果显示,白领新移民身份上的精神认同程度越高,其对自己和整个社会的信心也越高。白领新移民在与迁入地社会的互动过程中,为了生存和发展,尽快融入主流社会,需要不断思考如何重构和确定与新环境相一致的身份,寻求迁移的价值和异地生存的意义,最终解决“我是谁”这一根本性的主观问题。以上海白领新移民为例,移民必然要对当前新情境下的自我身份做出新的认知。因为空间的迁移,不仅使生活条件、居住场所、工作环境等具象问题得以改变,而且深入到抽象问题,特别是对有关个体和群体身份的追问。有学者指出,诸如移民的这类身份追问,其目的在于获得对身份“满意的、完整一致的意义解释,以便接受和平衡转变所带来的心理风险,使自我和变化着的环境的有效联系得以重建,以免于主体存在感的失落”^[6]。但白领新移民兼具白领和移民双重特征,注定了身份重塑的过程是复杂而漫长的。特别是在当前社会阶层之间流动快、变动大,个体化社会日益增强的背景下,人们的“自我认同”和行为选择与那些传统的阶级归属、家庭背景等决定因素发生断裂^[7]。白领新移民极有可能成为城市生活的“另类”,处于既不是外乡人、也不是本地人的夹心层境地,出现身份错位或失调。有研究认为,由于身份不是代表着以户籍为标志的体制性标定,还包括心理角色的内在确认。所以,在制度上解决了户籍问题的移民仍然可能会面临群体身份认同错位问题^[8]。可见,移民的自我身份焦虑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本研究中白领新移民内部的身份分化,表面上看是一种类别的划分,内在则蕴含着白领新移民群体身份差异的难以调和及可能因之而产生的危机和矛盾。因此,如果不能对目前白领新移民面临的身份困境及时进行处理,必然影响他们的社会认同感和城市归属感,“漂泊化”的生活



状态加上“过客”心理的蔓延,使该群体沦为“都市的他者”。相关研究普遍认为,“城市新移民产生身份重塑困境的原因在于个人身份建构与社会建构之间的矛盾,因而必须从内部条件、外部环境和政策建构等多个层级着手解决,重新塑造城市新移民身份”^[9]。诚如斯言,这就为实现城市发展与白领新移民群体发展所要求的同化与融合提供了解决的路径,可从以上方面着手,使白领新移民尽快脱离身份认同的困境,以期不断提升白领新移民群体的社会信心,降低社会

矛盾和社会冲突发生的可能。■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质量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11&ZD148)阶段性成果;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培育计划资助]

丛玉飞:吉林师范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方奕

参考文献:

- [1] 张文宏,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8(5).
- [2] 赵延东,J. Pedersen.受访者推动抽样:研究隐藏人口的方法与实践[J].社会,2007(2).
- [3] 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J].社会学研究,2005(3).
- [4] 赵文.城市青年移民生存发展状况调查及思考——以“新上海人”为例[J].理论月刊,2011(1).
- [5] 唐斌.“双重边缘人”:城市农民工自我认同的形成及社会影响[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8).
- [6] 钱超英.自我、他者与身份焦虑——论澳大利亚华人文学其文化意义[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0(4).
- [7] 李培林.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J].社会,2005(1).
- [8] 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认同研究[D].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2008.
- [9] 马德峰,李风啸.近十年来我国城市新移民问题研究述评[J].学术界,2010(1).

(上接第66页)

形式主义的认知方式,凭借着社会舆论和公众热点的讨论,导致学生对时事政治问题的学习只停留在一知半解的层面。这也导致首都大学生对于大学阶段开设的马列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的评价较低。

5. 多样性

西方的政治传统,是以自由、民主、“天赋人权”为基础的。而西方的政治观点对当代首都大学生的政治意识产生了重大的冲击与影响,表现出政治意识的多样性。从调查中我们发现当代大学生的政治意识多数为主流政治意识,但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识观点。在人权高于主权、西方的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国情、应该容许宗教人士在非宗教场所公开传教等系列问题中,约有20%左右的同学支持上述观点。这一方面说明当代大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有了极大的提升;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大学生政治意识受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影响较大。

6. 矛盾性

当今国内大学生的政治意识出现了复杂化甚至矛盾化的倾向。在调查问卷中,大多数大学生对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有信心,其中很有信心的占62%,信心一般的占34%;仅有4%的学生没有信心。但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可能真正容许中国崛起成为一流强国的观点,多数同学却表示赞同,其中26.94%的同学表示非常赞同,35.41%的同学比较赞同,25.57%的同学不清楚,7.86%的同学比较不赞同,4.22%的同学非常不赞同。大学生对自身的定位呈现矛盾化倾向,他们宽容自己的放纵,却唾弃别人的贪婪;他们回避或忽略自己的责任却常常指责社会的不公;他们虽然对许多政治问题充满困惑和不解,却不积极思考和调研问题的本质。当代大学生在要求他人和自己方面形成了双重标准,在思考问题和品评时政时又存在着立场差别,这些都是造成他们政治意识的矛盾性的根源。■

姚念龙: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工作部部长,副研究员

王鸿英:北京交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

责任编辑/汪永涛

参考文献:

- [1] 林静,黄联国.“90后”大学生政治意识状况特点及教育对策分析[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0(4).
- [2] 大学生学习态度功利化上课只为自身兴趣[EB/OL],<http://news.bangkaow.com>.